

XIANG XIANG



NONG MIN

想象农民

——乡土中国现代化语境下
对农民的思想认知与审美显现

(1895~1949)

◎张丽军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言英 ◎封面设计 陈少刚

◎农民形象是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庞大的形象群体。农民形象不仅是乡土中国现代化探索道路上的审美艺术结晶，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参与建构乡土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革命资源、文化力量。色彩各异的农民形象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独异现代性。因此，对农民形象的研究，就是探究乡土中国现代化、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路径。

◎本书作者从现代文学的农民形象入手，来探寻乡土中国现代化语境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审美想象，为21世纪新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为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呈现了一份来自文学的历史思考。

ISBN 978-7-209-04625-1



9 787209 046251 >

定价：26.00元

J207.4
54

XIANG XIANG



NONG MIN

想象农民

——乡土中国现代化语境下
对农民的思想认知与审美显现

(1895~1949)

◎张丽军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象农民:乡土中国现代化语境下对农民的思想认知与审美显现(1895~1949)/张丽军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7-209-04625-1

I. 想… II. 张… III. 当代文学—农民—人物形象—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1959号

责任编辑:李言英

封面设计:陈少刚

想象农民——乡土中国现代化语境下对农民的思想
认知与审美显现(1895~1949)

张丽军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网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格 16开(175mm×235mm)

印张 16.5

字数 310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月第1次

ISBN 978-7-209-04625-1

定价 26.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532)88194567



序言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农耕的发达和农业文明的灿烂与悠久，是作为“农国”的中国在进入近代以前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富裕和先进领先于世界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和人类的贡献。长期的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农国”，使中国社会的基本阶级和社会结构是“士农工商”所组成的，而在这样的社会阶层和结构中，主体是地主阶级（封建皇帝是这一阶级的集中代表），主要是由这一阶级所产生的“士”和由士所产生的各类“劳心者”，以及数量更为广大的“劳力者”——农民组成。千年农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及其国家机构存在和运转的主要功能，基本上就是调节地主、士、官吏等治人的“劳心者”与“治于人”的“劳力者”农民之间的关系，调节这两大阶级在阶级、政治和社会资源上的配置关系。配置和处理得协调和顺的时候，就是“治世”，处理得最和谐的时候就是“盛世”，否则就是“田民流亡”的乱世，被迫脱离土地的流民走投无路时往往揭竿而起。农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两大阶级或协调、或对峙、或彼此争夺的历史。这两大阶级中，劳力的农民又是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封建中国的最广大灿烂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创造者，是这些劳力的下里巴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里，学界和政治界曾经把农民起义看作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现在虽然对这一学说和理论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但无论如何，农民是构成农国中国的主体存在，是中国特色的最大的特色构成因素，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因此，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历史，不会真正了解中国的说法，这不是政治家的夸大其词，而是中国历史的基本构成和国情之所在。

进入近代，在如何抵抗率先掌握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如何拯救趋于边缘和衰亡的中国使之复兴和走向强大的现代性抉择中，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进行了艰难的选择和激烈的较量。最终，对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认识与把握最准确和清醒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农民问题。解决中国农



民几千年来一直渴望解决而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土地问题，并在这个问题上给予农民最大最彻底的许诺和希望，成为中共能够把千百万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成为政治和军事的力量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并取得成功的法宝之一。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进行新国家的建设中，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渴望只得到了暂时的满足，“唤起农奴千百万”的革命时代对农民拥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慨然许诺在一度兑现后又被收回和“挤兑”。在急速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现代性追求中，对中国革命做出最大牺牲和贡献的农民却被边缘化和工具化了——进行现代化积累的工具和奉献者。合作化到公社化实现的土地公有、户口制和城乡二元结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使农民成为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奉献者而不是受益者；在享受国家公民在教育、医疗、劳保、公共设施等公共资源方面，农民几乎没有享受到正常的国民待遇。而从自然到社会的大的灾难，又总是最多地落到农民身上。这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内伤和损害，也阻碍了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和进步。

因此，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国民经济趋于崩溃之际开始的改革开放，复兴和振兴中国的最伟大的一步，必然地从农村开始。而邓小平，这位被认为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超过二十世纪所有伟大经济学家（包括那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正是以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把土地再次还给土地上的农民的举措，开始了他对震惊世界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体设计，或者说，这位改革开放的伟大设计师设计的第一张蓝图，就是画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大地上。土地承包制虽然给予农民的只是土地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但即使这样依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短短几年，广大农村缺粮少食的现象得到根本的改变，城市里吃粮靠供应、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的中国“国情”很快成为历史。建国后，计划经济时代的最高领导人，一直强调要“升帐”，但却一直难以升帐；如扶不起的阿斗一样的“粮食元帅”，一直强调要“抓紧”，但无论如何抓紧也难以解决短缺的“粮食问题”。这个问题在土地承包几年后得到了根本的解决，但却又出现了农民“卖粮难”的问题。由解决农民与土地关系入手的农村改革的成功，为此后的城市改革和工业改革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就不会有后续的城市改革的推进。

如果说，农村改革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第一波浪潮，那么城市、工业和经济模式的改革是波涛更为汹涌的第二波大潮，这波改革和变革的深度、广度、复杂度、艰难度及其带来的经济与社会的巨大转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改革和转型中，中国农村和农民又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不仅为激烈变革中的城市和国家提供了基本上属于廉价的粮食和农副产品等物质生活资料，从根本上为社会的安定



和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农村生产力提高和解放带来的大量富余劳动力,又为城市和整个国家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同样廉价或低价的人力资源和人口红利。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和土地进入城市,进入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城市建筑企业,成为源源不断的农民工大军。大量农民工构成的低价劳动力成本,使得发达国家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与中国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一起分享低成本和人口红利的大餐,使得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使得中国制造的具有价格优势的产品出口到全世界,使得中国的外汇收入以几何倍数递增,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外汇和资金缺乏一变而为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并造成了始料不及的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富贵病”和钱太多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在城市,几乎所有的高楼大厦、所有的道路交通建设,都是由大量农民工的劳动汗水与建筑材料一起建成的,我们发电取暖用的煤炭也凝聚着大量农民的辛劳乃至血汗生命。我们城市的菜市场,我们很多家庭的钟点工或保姆,我们住宅的保安物业,我们城市的清扫者甚至拾荒者,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和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都有大量进城的乡下人在苦乐不均地默默劳作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了大量的农民工,我们城市和各类企业的运转都会出现大问题、大麻烦。农村和农民不仅是城市的衣食父母,也是城市的保姆。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成就,看到了中国作为大国和强国的崛起,在这伟大壮观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农民为之做出了世所罕见的巨大贡献,是中国崛起的最广大而默默的基石。

由于农民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他们是文明古国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与承载者,所以中国文学有史以来一直把农民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从《诗经》开始,农民及其生活和情绪就构成中国文学的主要内容,大量的田园诗、悯农诗和以各种各色农民为表现对象的小说,生动描绘了中国农村、农民的现实生存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丰富与芜杂,是形象化的农国史、农民史。进入现代以来,不仅政治党派从农村和农民那里寻找政治革命的资源力量,文学也同样把关注和表现的重点投向了农村和农民。作为现代文化和文学旗手的鲁迅,从开始思想、文化启蒙和文学写作伊始,就始终把农民作为思考与表现的主要对象,不论是追求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和启蒙,还是思考“立人”和“立国”的关系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国家的命运,农民都在鲁迅的思考和描绘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鲁迅文学世界最辉煌的成就,是与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和农民命运的表现分不开的。鲁迅所开创的这一新文学传统,深深影响着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一大批文学现象,如乡土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土改文学、十七年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打工文学,都与农村和农民的生活与命运紧密相联;一大批著



名的经典性的文学作品，如《阿Q正传》、《祝福》、《故乡》、《田野的风》、《春蚕》、《丰收》、《多收了三五斗》、《荷花淀》、《铁木前传》、《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山乡巨变》、《创业史》、《李顺大造屋》、《乡场上》、《红高粱》、《白鹿原》、《活着》等，以及这些作品的作者如鲁迅、茅盾、沈从文、周立波、赵树理、丁玲、孙犁、柳青、莫言、陈忠实、余华等，都因对农民形象塑造得出色和对农民命运思考表现得深刻而镌刻于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位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因其描写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小说《大地》而获得了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的获奖，并不是她的文学才华多么出众和作品多么伟大不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趋于淡薄，而是由于授奖的西方读者和西方人意识到中国的历史与文明、中国的现实与社会中农民的广大与重要，意识到一个诞生于、生长于中国的西方女性描写中国农村的视角的独特性和真实性是有价值的。简言之，是中国农民的重要所构成的中国历史和国家的重要，成全了赛珍珠和她的作品。就对中国农村与农民的表现及其文学成就而言，赛珍珠远不如上述的中国现代作家与作品。从现代到当下，中国社会的每一次、每一个大变动都与农村密不可分，而对现代到当下的每个变革时期中国农村与农民的沉浮变迁，文学都做出了及时而深刻的反应、沉思与观照，它们构成了现当代中国史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从文学方面为中国留下的宝贵的历史、文化和精神遗产。现当代文学的伟大和不朽，是与这一部分作家和作品联系在一起的。

张丽军在读博士期间，大概是出于“地之子”的本能和情怀，对现代文学中描写农民和农村的作品情有独钟。在广泛阅读相关作品的基础上，他以现当代文学中农民形象的书写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在开题时，作为指导教师的我和其他专家认为现当代的范围太大，建议将时间范围缩小，同时不要写成形象史，也不要写成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史或农民史，而是把作为重要社会问题的农民和农村如何进入文学书写、怎样进入文学书写、作家的农民关怀与文学中的农民书写的关系、农民书写中的历史与审美关系如何处理及处理得如何、对文学史影响的得失等问题，进行细致的阐述与梳理。张丽军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结合着对作品和史料的大量掌握以及对有关文学、美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广泛涉猎，下了大工夫写出一部三十余万言的论文，经过修改后也有二十多万字。博士毕业后张丽军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工作之余又对论文进行了修改，现在看到的，就是修改稿。前人有言，文章不厌千回改，何况又是现代历史和文学中这么重要而复杂的农民问题及其书写，在一部书或者几部书中臻于完美是不可能的。应当说，认真而又特别能吃苦的张丽军在论文中提出的问题是重要而有学术价值的，其对问题的梳



理是清楚和比较细致的,很多方面的阐述都有独到和深刻之处,当然,还有很多方面可以更深入地分析与阐发。我个人认为,在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和农村书写的研究方面,此书是具有自己的价值的,这价值就在于,它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总结与拓展,同时也对继续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诸多方面的借鉴和启示。一部学术著作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相当令人欣慰的。

是为序。

逢增玉

2008年1月8日于北京边缘斋



1. 农民主体地位被“发现”的过程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在现代中国,农业都一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是社会上数量最为庞大的群体。《汉书·昭帝记》说:“元本元年春二月,诏曰:‘天下以农桑为本。’”中国大陆型的地理结构决定了农业的高度发达和社会制度的农业特征。传统农业文明积淀所形成的系统性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民俗文化、典章文献,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底色,是现代文学对农民形象进行想象与建构的思想起点。古代《诗经》对传统农业有非常精彩的叙述与描写,其中的一些篇章如《诗经·国风》中的《伐檀》、《硕鼠》等深刻地展现了农民的现实处境与精神状态。《诗经》所开创的表现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此后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文化传统和叙事主题。

1840年是传统中国历史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分界点。1840年后的中国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之中。被裹挟进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乡土中国无从做好现代化的准备,占人口比重极大的农民思想意识与生产、生活方式依然处于前现代阶段。占乡土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能否实现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即农民能否成为具有现代人格主体的现代人,是乡土中国能否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完全实现现代化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1895年,严复从中国封建社会秦朝对农民的愚民政策、奴役统治谈起,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所遭受的长达千年之久的奴役统治和因此而带来的农民心理内化了的奴隶意识。对此,严复提出了著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学说。“三民说”是晚清时期第一次以一种现代性意识对中国农民的思想认知与精神审视,是梁启超、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人想象中国农民的思想原点。

梁启超继承并展开了严复所提出的三大改造中国民众的命题,在林纾、康有为等人倡导“说部”主张的启发下,借鉴欧洲、日本政治小说变革社会、唤醒国民的启蒙作用,发表了《新民议》、《新民说》等论文,提出了以小说“新民”的现代性思想启蒙路线。以梁启超为标志的“新民说”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的国情、乡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开启了一个以中国“国民”为建构现代中国主体、以政治小说来改造中国“国民”的落后封建思想的现代化道路新指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提倡“文学革命”，提出了“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等文学概念，发展形成了“人的文学”理念，从而确立了现代文学想象中国农民的现代性精神起点。这些，在文学创作中，直接影响了鲁迅的“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启蒙文学和沈从文的文化人类学意蕴的、“文化重建”的“乡土抒情诗”。

梁启超以“小说”来“新民”的现代性思考显然是以拥有知识的城乡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而对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及其重要性的认识，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此时的新民之民还是处于被改造的客体对象，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尚没有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主力军。直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农民的革命主体身份才得以确立，农民在文学作品中成为革命的积极性因素，农民形象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中得到审美呈现。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民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开展农民斗争作为发动群众的重要工作。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也逐渐认识到，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革命就没有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革命便要失败。1924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意味着国民党对农民认识的深化，但北伐革命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却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6年，在对农民运动进行侮蔑和中伤的浓厚氛围中，毛泽东以自己的实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表达了对农民运动的真知灼见和对农民地位、作用的深刻理解。

1926年，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有了全局性的整体认识。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农民与中国革命的本质关系：“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①毛泽东在文中对乡土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突出显示了中国农民对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全局性、根本性的作用。如果说五四运动中的周作人发现了“人”，那么大革命运动中的毛泽东则发现了“中国农民”。对中国农民的发现，意义是极为深远的，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认识，是对乡土中国现代化所独具的社会特性的深刻把握，标志着中国现代化政治视野对农民的真正发现。一条具有乡土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勾勒出了朦胧的现代轨迹。

1927年9月郁达夫在《农民文艺的提倡》一文中指出了要提倡不同于从前的、只以赞颂田园风景和称许农民生活的高尚为能事的新型农民文艺，这为作家对中国农民文艺的关注、重视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精神维度和思想资源。郁达夫对农民文艺的提

^①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7页。



倡是建立在把农民视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的认知前提上的。郁达夫的这种阶级想象是以农民为中国现代化根柢和主体的阶级想象,是以“农民阶级,要占最大多数,最大优势”为表现主体的农民本位的文学想象。但是遗憾的是,郁达夫虽然提出了这种农民本位的农民文艺主张,但是却没有在文学创作中实践这一农民本位的理论主张。真正具体到文学内部对乡土中国社会、中国农民及文学中的中国农民形象进行理论思考和审美观照的是1928年后革命文学高潮的时期。

1928年,蒋光慈已经清晰地阐述了左翼文学对以中国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形象的审美想象与建构方式,即由过去的“暴露”、“攻击”、“批判”转向为对“新的,能够创造光明的力量”、“新生活的元素”的寻找、发现、促进,由对愚昧、落后的被压迫者形象转向为“反抗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是创造新社会的主人”的新形象的塑造。在具体的文学审美想象中,蒋光慈提出了反个人主义、表现集体主义和群众力量的文学创作原则。3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东北作家群文学都体现了以农民形象为主体、进行正面形象描写的乡土中国叙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开始建立起了于此新形势相适应的新意识形态。在延安解放区,文艺为什么人、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即文艺怎样为农民革命服务的问题显得极为突出。1942年5月2日至5月23日期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和艺术家的身份在会上提出了新的文艺政策,形成了一种服务于中国农民革命的新意识形态,这对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不是从文艺本体论的角度来阐释艺术的本质,对“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的本体论观念进行抨击,而是出于一种政治家的革命考量,为了服务并服从于中国革命的需要来提出文艺政策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新意识形态是源于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思想,是毛泽东领导工农大众反抗内外压迫、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一文一武”战线上的重要思想成果。毛泽东“工农兵方向”文艺思想第一次从文艺指导思想上真正使农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获得了庄重的生命尊严,使翻身解放的农民第一次发出了欢天喜地的声音。毛泽东“工农兵方向”文艺思想的提出,平息了当时延安文艺界的争论,为当时文艺界指明了方向,有力地配合了时代现实国情,从思想文化上打击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延安解放区文学中的翻身农民形象,作为正面主角、大地主人与革命英雄出现在中国的社会历史舞台上。

毛泽东1942年的讲话,对赵树理小说的出版,以及对赵树理能够成为一位进入广大农民群众阅读视野的、知名的农民文学作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赵树理的作品真实、生动、幽默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的生活及意愿,表现了翻身农民对自由幸福生活的追求,表现了农民正在成长的觉醒的力量以及觉醒中各种复杂力量的博弈。赵树理表现

农民翻身生活不同于其他作家的一个最大之处是,赵树理不仅表现了农民翻身的喜悦、烦恼,还对翻身之后农民新身份的蜕化、农村新压迫力量的出现进行了描述与展现,显现了一个农民作家的高度敏锐性与崇高使命感。因此,赵树理被誉为“农民作家”。

2. 现代文学农民形象被忽视的研究现状

从1917年新文学发端直到解放后,农民形象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庞大的形象群体。学者庄汉新、邵明波在编著《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论评》一书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乡土小说作家竟是整个中国20世纪小说作家中一支实力雄厚、阵容强大、人多势众的生力军、主力军。他们在数量、质量、知名度和影响力诸方面,竟占了整个20世纪小说作家的大半以上。他们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名篇佳作,竟成为了20世纪整个小说发展的主流,构成了20世纪整个小说世界的基本面貌,甚至在整个20世纪文学的家族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①

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对现代文学农民形象的认识,仅局限于某一个时期的阶段性的研究,或囿于政治性、文化性观照,对现代文学农民形象的整体性、本体性研究还处于缺少状态。目前国内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对鲁迅创造的阿Q形象的解读。在当代学者对农民形象的研究中,较为持续的有夏子、丁帆、赵园、石世明、程光炜、陈继会等,但是,也只是局限于阶段性研究,缺乏整体性观照和本体性研究,不是立足于农民形象本体意义的研究。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琳琅满目的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中没有一部是关于农民形象本体意义的研究。

有关中国农民形象的学术著作,较为突出的有丁帆先生的《中国乡土文学史论》、《大陆和台湾乡土文学比较史论》,杨剑龙先生的《放逐与同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陈继会先生的《中国乡土小说史》等,均立足于乡土作家、乡土小说、乡土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没有对农民形象进行整体性和本体性思考。范家进先生的《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对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三位作家进行了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位作家的生活视域、精神资源、心理镜像并对其乡土小说进行比较分析,是对作家和文学形象关系的解读。中国社科院文研所赵园研究员的《艰难的选择》、《地之子》都广泛地涉及了乡土文学和农民形象,尤其是《地之子》一书对农民形象的研究,综合了古代社会与农民的关系、现代文学外来思潮中农民的视角,并对农民形象和农村文化进行了较深刻的解读,书中处处表现的是对知识分子作家内心世界的探讨。逢增玉先生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立足于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对东北作家群中的农民形象进行了细致研究。

^① 庄汉新、邵明波:《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论评》,学苑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页。



河北大学刘增杰教授主编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万国庆的《凝眸黄土地——延安文学史论》等对解放区农民的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综合性研究。

论文方面,新时期以来对农民形象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对个别作家作品里的农民形象进行研究,进行较大时段与整体性研究的还不多。朱晓进的《三十年代左翼农村题材小说的时代特征》、赵园的《现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文化》、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光炜的《论50~70年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蒋晖的《中国农民革命文学研究与左翼思想遗产的创造性转化》、朱尧耿和田中阳的《立人·立国·立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农民形象的审美角度之变迁》、田中阳的《论五四以来新文学对农民形象审美视角的三次选择》、肖佩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流变轨迹》以及刘冬梅的《“农民视角”与百年中国文学》等等,从不同的视角来透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这些论文对农民形象的分析、解读具有许多新意,但是有的还较为粗疏、不够精细,不是立足农民形象本体的研究。

在中国农民社会学研究中,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对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民做了深刻解读,指出了乡土中国社会结构“差序格局”的特征,驳斥了一些知识分子视农民为愚昧、无知、落后的观念,他的《乡土重建》对乡土中国现代化提出了独创性的思考,至今仍然焕发着思想魅力。秦晖(主编了“农民学”丛书)的《田园诗与随想曲》和《天平集》等对乡土中国问题和古今中外的农民定义进行了分析探讨,具有很强的思想性。于建嵘、温铁军、贺雪峰等当代学者对当代乡土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对农村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与描述,对分析现代文学农民形象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当代社会学学者高王凌重新对地主、农民、地租等关系进行了实证性研究,这对理解乡土中国的真相、中国农民的真实存在状况提供了有力证据,也对重新理解现代文学农民形象提供了新的思维视角。

海外,农民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有美裔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美国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等,为农民学的研究提供了新颖视角,尤其是黄宗智的乡土中国农业经济“内卷化”概念的提出,对于认知乡土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维视角;农民哲学方面的研究有日本祖田修的《农学原论》,对乡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想认知具有很大的思想价值。

3. “作为方法的乡土中国”——本论文研究思路

现代西方汉学对中国现代化研究有一种“刺激—反应”的思维模式,以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与内涵为参照,来比照中国的现代化。这种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化”成为印证西方现代性的他者,是以西方现代性的普世性对中国独特现代性的遮蔽,遮蔽的恰恰是中国现代性所独具的特征。因而,这种“中国现代性”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也无法真正理解和阐释事实存在的许多“中国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



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这都是西方现代性所无法回答的问题。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已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抛弃了“刺激—反应”的被动性研究，不再以西方的现代化来剪裁中国的现代化，而是回到中国历史本身，从中国历史的丰富细节中寻找中国现代化的特质因子。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中国史研究中，十分注重探索和讨论“作为方法的中国”。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文译本名为《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人民大学1996年版）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就是“中国基体论”。所谓“中国基体”，是指“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历史情况及其发展规律，这种发展规律可以从其长期绵延不断的各种丰富的历史演变中窥测到，因此中国的近代应该是可以与前近代的关联角度上把握的。”对于中国历史，只有置于中国历史和文化自身的语境中才能得以理解，中国本身就是一种视角，就是一种方法。应该用中国本身的历史和事实来研究中国，从中国内部的历史事实出发，探究中国现代化的内部原因、内在动力。

海外学者王德威先生在《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一书的序言中，提出“小说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视点。

“小说是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种文类。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小说纪录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种种可涕可笑的现象，而小说本身的质变，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表征之一。……由涕泪飘零到嬉笑怒骂，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之命运’看似无甚紧要，却每有若合符节之处。在泪与笑之间，小说曾负载着革命与建国等使命，也绝不轻忽风花雪月、饮食男女的重要。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声喧哗。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

但由小说看中国这样的观念，毕竟还嫌保守。我更是借此书强调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国家的建立与成长，少不了鲜血兵戎或常态的政治律动。但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我们不能不说叙述的必要，想象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然而我们如果不能正视包含于国与史内的想象层面，缺乏以虚击实的雅量，我们依然难以跳出传统文学或政治史观的局限。一反以往中国小说的主从关系，我因此要说小说中国是我们未来思考文学与国家、神话与史话互动的起点之一。”^①

王德威先生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的演进与质变史中，洞察小说与现实中国的深刻而又紧密的关系，认为小说“更真切实在”地反映出了现实中国的真实，提出了“小说中国”的研究视点，点出了“小说中国”对现实中国的“国魂”、“国体”、“国格”、“国史”的巨大影响力量。所以，在王德威先生看来，“小说中国”已不再仅仅是现实中国的审美映现，而是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先在理念图式，是建构中国现代化历史实践

^①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9月北京第1版，第1—2页。



中的一支重要的文化力量,并将影响未来中国历史的书写。应该说,王德威先生的“小说中国”观点深刻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学高扬小说文体价值这一重要特征。

作为“小说中国”形态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学,以审美的方式对农民这一中国革命历史主体进行了想象性叙述,塑造了类型众多、形态各异的农民形象,直接参与了中国现代化的建立与发展,即以审美的方式来想象与建构了一个由众多“农民形象”所组成的“乡土中国”。由于中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体地位,乡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所构成的丰富社会生活内容在通过文学来表现的时候,都无法绕开农民,都充满了对农民的想象与建构。从1917年新文学发端直到解放后,农民形象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庞大的形象群体。

现代文学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从中国现代小说诞生的时候起,就已经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是与乡土中国现代化过程紧密相连的。“小说”、“中国”一起构成了现代性的两个命题,紧紧地连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建构,因此“小说中国”就成为考察乡土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毫无疑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庞大的形象群体、也是“小说中国”“新民”的主要对象的农民形象,就成为进入探究乡土中国现代化、现代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路径。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描绘的巨大农民形象群,以及研究者对这一群体研究整体性照的缺失与不足,本论文选择农民形象作为研究乡土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切入点和基本单位,即以“乡土中国”作为视角与方法,力图从乡土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农民这一中心问题,透过中国现代作家审美想象与建构的农民形象,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民的思想认知、对乡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分析中国农民在乡土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形象变迁和思想意识的觉醒,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独具的现代性研究,即现代文学众多色彩各异的农民形象就是乡土中国现代化审美叙事的中心内容,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独具的特色之一。乡土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农民、中国现代文学与农民形象,具有一种相互映现的同构关系,构成一种互动的共生联系。

因此,本论文结合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进行研究,透过不同文化政治力量影响下的中国现代作家对农民的审美想象,归纳出现代文学史上不同类型的农民形象,并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形象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进行研究,分析不同农民形象背后的思想根源与精神渊源,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农民形象出现的根本原因: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众多不同的农民形象是根源于中国现代作家对乡土中国、中国农民的不同思想认知和审美想象的。本论文在进行历时性研究的同时,吸收当前国内外关于农民、农村现代化的最新研究理论成果,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中国农民认知的思想局限及其审美想象的农民形象进行反思,进而对乡土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进行返观与审视,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农民形象与乡土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农民形象是现代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化的纽带与桥梁,是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主体的理想性建构和革命性改造,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理解与选择。农民形象不仅是乡土中国现代化探索道路上的审美艺术结晶,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参与建构乡土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革命资源和文化力量。现代文学农民形象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乡土中国”叙事特征,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现代文学世界里的“小说中国”即是一个“乡土中国”,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中国,其审美显现的感性形象和中心角色即是“中国农民”。